

管林森 李斌成 主编

中华牛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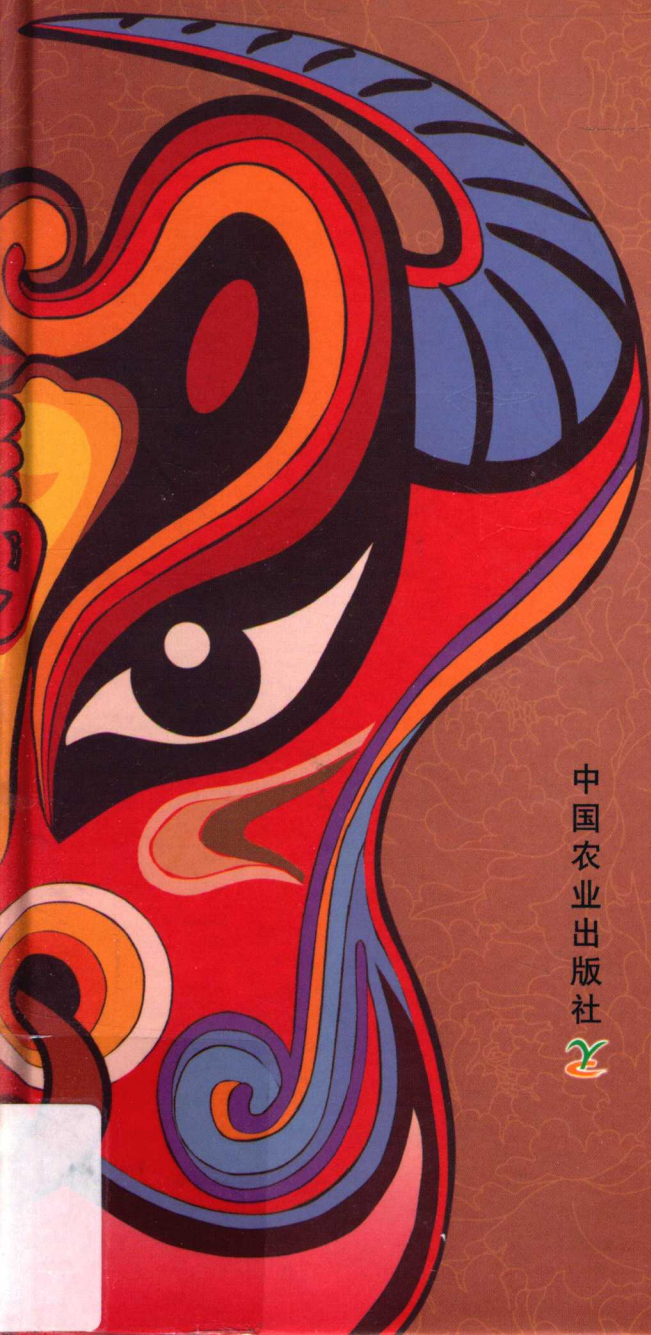
李斌成



中国农业出版社



历史文化中的牛
政治文化中的牛
农耕文化中的牛
原始文化中的牛
民俗文化中的牛
宗教文化中的牛
地理文化中的牛
器物文化中的牛
语言、文学中的牛
斗牛与战争中的牛
古今名人与牛



阅 览

曾林森 李斌成 ◎ 主编

中华牛文化

李斌成



中国农业出版社



G122
20132

P1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华牛文化/咎林森, 李斌成主编. —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0.11

ISBN 978-7-109-15166-6

I. ①中… II. ①咎…②李… III. ①牛—文化—中国 IV. ①G122②K892.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216969号

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北路2号)

(邮政编码 100125)

责任编辑 刘博浩 杨 洋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2012年7月第1版 2012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 720mm × 1000mm 1/16 印张: 26.5

字数: 492千字

定价: 168.00元

(凡本版图书出现印刷、装订错误, 请向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主 编：咎林森 李斌成

副主编：惠富平 白君礼 王 倩 李晓春

参 编：马良义 刘 扬 张 洁 王芳侠

任经文 张利庆 白庆渔 张双奇

汲取中华牛文化精粹
促进我国农牧业发展

二零一九年八月 陈宗兴

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宗兴为本书题词

弘揚中華牛文化
發展現代畜牧業

張寶文
二〇〇九年
十月

序 一

大约在十年前，我刚到中国奶业协会工作不久，因工作关系结识了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咎林森教授及其率领的科研团队。咎林森教授作为一名优秀的中青年专家，继承了我国著名养牛专家、原西北农业大学邱怀教授未竟的事业，立足陕西，面向西北，在肉牛、奶牛遗传改良及其产业化开发方面，继往开来，拼搏进取，成效显著，在学术界、产业界影响较大。多年后，这个团队又开拓了中华牛文化这一新的研究领域，目前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在集中反映他们研究成果的著作——《中华牛文化》即将在中国农业出版社付梓之际，咎林森教授嘱我为该书作序。作为一名“牛人”，我看到这朵农业文化研究领域绽放的奇葩，非常高兴，乐之为文以嘉勉。

我国是世界上养牛大国之一，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牛及牛产业孕育了极为丰富多彩的文化资源，为人类文明增添了光辉灿烂的一页。农耕文明时期，牛是国计民生之基石。“牛废，则耕废；耕废则食去；食去，则民亡；民亡，则何恃为君”（新唐书·列传第

四十三)是其真实写照。此外,有两个汉字,我觉得最能反映中华牛文化的基本内涵。一是“物”字,在甲骨文中“物”的偏旁从牛,牛是物之大者。《说文》中对“物”的解释为:“万物也。牛为大物。”这不仅可以推测上古时期,牛人们对认识物质有极大影响,而且还可证明牛在中国古代政治、经济、社会、宗教等各方面所处的重要地位。二是“件”字,从结构上就明显看出人和牛是一种联系紧密、互相依存、须臾不可离开的特殊伙伴关系。在中国所谓“牛,件也;件,事理也。”其含义就是“件”,既从“人”,也从“牛”。从“人”,可称为“人化”,就是按照人的要求改变牛,让牛更好地为人类服务;从“牛”,可称为“化人”,就是人要按照牛的生长发育规律,满足其要求,尊重其福利,同时又接受牛优良特质的影响,提高自身的境界。这种“人化”与“化人”的互动过程,就构成了中华牛文化的发展脉络。直到今天,这种互动过程仍在继续着。在“人化”方面,牛作为役力为主的角色渐渐削弱,而为全面小康社会提供乳肉优质高蛋白食品的功能将日益突显。为适应这一转换,牛的品种选育,乳肉兼用型则具有革命性、方向性、战略性。只有如此,才能使牛饲养业更好地发挥其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在“化人”方面,脚踏实地、任劳任怨的老黄牛精神;披荆斩棘、锐意进取的拓荒牛精神;鞠躬尽瘁、无私奉献的孺子牛精神等等,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中,在建设文化强国、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仍将熠熠生辉,具有历久弥新的生命力。这些大概是《中华牛文化》的写作团队撰写此书良苦用心。也应是我们今天有必要重视《中华牛文化》出版的意义所在。

通览全部书稿,我认为本书有两个最大的特点:

一、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大胆创新。此前关于牛文化方面的撰著也偶有所见,但咎林森教授的科研团队敢为人先,不落俗套,在牛业科学研究领域不断创新的同时,在牛文化研究方面有新的探索。研究工作涉猎面广,内容丰富,不仅系统的总结了中华五千年农耕

文明中的牛文化，又增加了许多后现代文化的内容，具有时代气息。

二、注重文献考古研究与民间文化研究的结合。牛文化研究以前大多局限于文献考古研究，做的多是案头工作。本书编撰者则充分地吸收了民间文化，深入民间获得大量的口传内容、风土习俗以及画页图片，全书文图并茂，具有生机和活力。

《中华牛文化》出版，可喜可贺。鉴于文化层面的研究对于一个长期从事自然科学的科研团队来说本身就极具挑战性，加之牛文化研究又是一个全新的命题，可资借鉴的相关作品并不多，该书作为咎林森教授团队有关牛文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和读者见面，渴望能收到抛砖引玉之效。真心地希望他们在更广阔的范围、更深的层次上继续开展牛文化的研究。

以上千余言，滥竽充作序。

刘成果

2011年12月15日

序 二 ▶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咎林森教授邀我为其编著的《中华牛文化》写篇序言，我慨然应允。《中华牛文化》是一项新鲜且有意义的选题，待阅读了全书校样后，这种认识便愈加明晰而坚定了。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悠长绵远，五千年的积淀，雄浑博大。尤其面对未来社会的挑战，中华文化以其深厚的内涵、圆融的睿智、独特的魅力，展现了自己的风采，在和世界其他文化的碰撞、比较、交流、融合的过程中，愈发显示其勃发的生机。占全人类五分之一多的华夏儿女，同种同脉，同源同文，在地球的各个角落，以自己的聪明才智，推动着世界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单看分布于全球的三百多个孔子学院这一事实，就可以发现中华文化历久弥新的强大力量。中国近代史上，因为我们中华民族的贫弱、落后而屡受外强的侵略与凌辱。于是无数仁人志士，痛心疾首，发扬中华文化的“内省”精神，高扬批判大旗，检讨传统文化，学习吸收其他民族文

化的精华，意欲富国强民，使神州古国再显雄风于宇内。这是数百年来中华民族光荣、伟大而又十分艰巨的一项事业。时至今日，经过数十年的奋斗，我国经济繁荣、民殷国富、盛世和谐，中华文化又欣逢其时。

我们现在必须努力研究、总结中华文化，发扬其精华，更好更快地使中华文化传播宇内，实现与世界文化接轨，这也是我们华夏所有有识之士义不容辞的任务。从这个角度说，《中华牛文化》的出版是很有意义的。

当然，文化之概念，见仁见智，或广或狭，完全可以多方面去理解。但我以为，作为民族文化，其内涵和外延应该是广义的，是内化与外现的有机结合。内化，犹如融入血液中一样，存在于该民族文化圈所有成员的思维、认识、情感、意志中，是一个民族凝聚的内驱力和一切行动的发动力。外现则表现为语言、行为、风俗、习惯等，包括知识、技术等经“物化”而产生的各种器物用具，范围广泛，不一而足。古往今来，这些有形、无形的“文化产品”或“文化现象”，是构成我们民族文化的主要内容，我们总结、研究、梳理、解析文化时，既可以从宏观上把握，又可以从微观上挖掘。但无论怎样做，各民族文化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研究者完全可以从自己的角度出发，从民族文化的某一方面入手，做深入的发掘与研究，揭示新的内蕴，丰富民族文化宝库。这就是应该为《中华牛文化》的出版击掌叫好的原因，也正是这本书出版的新意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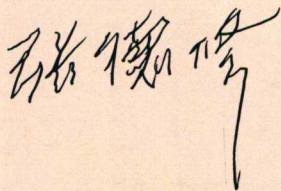
通过阅读书稿，也给我另外一种启迪。过去我们做研究，自诩“皓首穷经”，源必溯坟典索丘，本必追论孟老庄，奉西哲为真理，视东典为圭臬，以案头书籍或考古实物为依托，言必有据，不越雷池。但实际上，每个民族文化更多的是存在于活着的人的群体中的，如口传、如风俗、如习惯、如喜好、如价值观念、如行为方式……总而观之，有“两种”（或者有多种）文化现象。这些以文字记载、以器物凝固于历史上的，往往只是“一部分”或“一种”存在形式，

文化的其他存在方式往往由于时间关系、地域关系、交际关系等被忽略，任其自生自灭。而文化研究者根据文化的部分资料而得出的结论，就难免失之于偏。过去人们也注意这些，但因其资料散而杂、整理研究工作费力，使得我们丢掉了许多非常宝贵的东西。实际上，民间散存的东西，只要重视搜集，只要挖掘整理，总可以沙里淘金，发现民族文化的精粹。近些年来，我国出现的原生态音乐，特别是侗族大歌，不是让世界震惊吗？所以作为民族文化研究人员，应该深入民间去搜集一些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斯可谈开拓民族文化研究的新局面。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各民族文化圈并没有一个适合于全球各民族的“普世”的文化标准。只有把我们民族文化研究工作搞深入了，把我们民族文化的特点非常鲜明地凸显出来，且达成了共识，我们就可以自豪地说：我们是有资格、有能力、有信心去和世界“接轨”的。倘若永远以别人的是非为是非，以别人的标准为标准，那只能标示着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没落！

或许这就是《中华牛文化》出版的深层含义，也是我为什么要在书前赘言，写下这些文字的缘由。当然，正如苏轼在《答毛滂书》中所言：“文章如金石，各有定价。先、后进相汲引，因其言从信于世则有之。至其品目高下，盖付之众口，决非一夫所能抑扬。”以上所言，仅为己见，非敢一语定论，权作引玉之砖而已。仁智忖度，全凭方家定夺。

言不尽意，谨以此为序，与各位同仁共勉。



2012年春

前言

“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每逢新年伊始，广袤的中华大地上首先响起的便是牛的赞歌。熟悉的旋律，朴实的内涵，都会让每个华夏儿女，心潮激荡，迈开创造未来的脚步。

“一年春作首，六畜牛为先。”，在华夏历史的漫漫长河中，一直活跃着牛的身影。《易经》中有许多有关“牛”的筮辞。几千年前，中华先祖就认为：凡是得“牛”便是“吉”，有“童牛之牯，元吉”（用木架架住公牛的角，大吉大利）、“畜牝牛，吉”（饲养母牛，必获吉祥）、“用大牲吉，利有攸往”（祭祀用牛牲，必获吉祥，利于有所举动）的记载；而失“牛”的便是“凶”，如“或系之牛，行人得之，邑人之灾”（有人将牛拴住，过路的人顺手把牛牵走了，邑人丢牛得了意外之灾）、“丧牛于易，凶”（在田边丢失了耕牛，必遭凶险）。可见牛在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中具有多么重要的地位。

在我国古代采猎以及向农耕经济过渡时期，人们猎杀或者养牛都是为了食其肉，用其皮骨。首先是人们的食品，其次用于祭祀，

再次用于耕田，而祭祀和耕田恰恰分别是古人精神信仰和物质生活的核心内容。《礼记·曲礼》上说“凡祭宗庙之礼，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刚鬣，豚曰腍肥，羊曰柔毛，鸡曰翰音，犬曰羹献，雉曰疏趾，兔曰明视”，可见在古代祭祀中作为祭祀，牛的品级最高。《曲礼》有“天子以牺牛，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所以，在古代社会只有天子、诸侯和大夫才有资格享用牛牲。后来因为牛的力气大，便逐渐发展为役用。先用于拉车，牛车是最古老的重要陆地交通工具。到春秋时代，“宗庙之牲，为畎田之勤”，牛始用于耕田。《汉书·魏相丙吉传》中记载了一则“丙吉问牛”的典故，西汉时的宰相丙吉外出办事，见人打架打得头破血流都不理会，而见到一头牛吐舌喘气却要上前询问清楚，可见当时国家对于牛的重视。

中国古代以农立国，历代王朝都强调牛是稼穡之本。所谓“君所恃者在民，民所恃者在食，食所资在耕，耕所资在牛。牛废，则耕废；耕废，则食去；食去，则民亡；民亡，则何恃为君”（《唐书·张廷珪·传》）最清楚不过地表达了古代政治家对牛之关乎世运国步的理解。至于普通百姓，对牛更是视之为安身立命的根本，陈旉的《农书》中称“视牛之饥渴犹己之饥渴，视牛之困苦羸疾犹己之困苦羸疾，视牛之疫病若己之有疾也，视牛之孕育若己之有子也”。直至上世纪20年代，毛泽东还在《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一文中强调“牛，这是农民的宝贝。‘杀牛的来生变牛’，简直成了宗教，故牛是杀不得的”。

几千年来，人们在与牛的长期接触过程中，摸索和积累了丰富的养牛经验。孔子的门徒冉耕，字伯牛；司马耕，字子牛，这说明“牛”与“耕”早在那时就有了联系。战国时用牛耕田在秦国已经很普遍，齐国“饭牛而取上卿”的宁戚就著有我国最早的畜牧专著《相牛经》。汉代赵过推广牛耕，使得牛耕逐渐普及全国。自汉代以后的2000余年来，许多出土文物更可证明牛耕的发展。到唐朝初年，牛的轭具或耕作技术，都已发展到相当于近代农具的水平。实际上，牛

在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的历史上，确实发挥了无与伦比的重要作用。

牛在农业社会中与人长期共处，结下了不解之缘。人们对牛的深厚感情，使得牛成了文学和艺术作品中的常客。我国古代有关牛的诗词歌赋、典故轶闻数不胜数。《诗经》中就有《无羊》篇，生动地描绘了牛的生活、饮食、住处、交配等各个方面；南宋李纲的《病牛》则表现了牛的不辞劳苦、奉献到底的崇高精神；牛郎织女的传说更是家喻户晓。在古代的绘画和雕刻艺术中，牛俑、壁画牛、绘画牛、牛形用具、牛画像砖石、古币牛等牛的身影也随处可见，如战国晚期的牛虎祭案、汉代盛行的陶塑牛俑、唐代的五牛图等等。

到了近现代，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机器逐渐取代了耕牛的位置，牛逐渐又转向肉用和乳用。牛一生为人类鞠躬尽瘁，死后又不留骨肉皮毛，且牛肉、牛奶作为低脂高蛋白的高级食品，已成为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重要标志；牛皮还可用于制革，牛黄则是著名中药材，甚至“牛溲（牛尿）”也是“可备药笼之资”，真可谓牛全身都是宝。

不管牛的角色怎么转变，牛所具有的“厚德载物，吃苦耐劳；脚踏实地，奋力向前；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的精神永远为人们所推崇。鲁迅先生不仅礼赞牛“吃进去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还要自勉“俯首甘为孺子牛”。我们要发扬牛精神，弘扬牛文化。爱情上，不忘牛衣对泣，天天都是牛女佳期；学业上，要如同“老黄牛”，时常牛角挂书，不用扬鞭自奋蹄；事业上，要学做一头“拓荒牛”，披荆斩棘在所不辞；实际工作中，做一头“孺子牛”，默默耕耘无私奉献；日常生活中，我们则不妨多来几次牛刀小试，在“牛市”与“熊市”的交替中，大展“庖丁解牛”之技，“牛”转乾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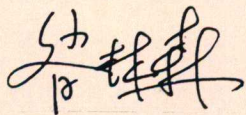
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对于牛的研究、开发、利用，已经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和过去已不能同日而语。但是，作为中华民族，与牛的情感、关系、渊源等，几乎到了不可分割的地步，颇具民族特色。因此不管科技如何发展，人们的生活进步到何种程度，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要研究牛科技，推广其成果，就必须研究中华

牛文化，把现代科技与悠久而丰富多彩的风情、民俗结合起来，与中华民族的心理结合起来，契合中华牛文化的内在传统和精神，才能具有坚实的基础，才有可能取得突破。否则我们的科学研究将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很难取得大的突破。这应该是每一位牛科技研究者都十分清楚且努力实践的。

说牛话牛，又不能不说说我国的秦川牛。秦川牛因产于陕西八百里秦川而得名，系中国黄牛的代表性品种，以其优越的肉用性能和抗逆、耐粗饲等特性而位居我国五大良种黄牛之首。有关秦川牛的起源可追溯到南北朝时期，千百年来，秦川牛这个古老的品种经历了由肉用到役用再到肉用的历史轮回，如今已成为大陆供港活牛的首选品种，备受业界推崇。而以“秦川牛”命名的“秦川牛精神”则一直激励着我们奋力前行，那就是：“九牛爬坡个个出力的合作精神，抵不倒南墙不回头的拼搏精神，披荆斩棘锐意进取的开拓精神，脚踏实地永不松套的实干精神，负重奋进不甘落后的争先精神，生命不息耕耘不止的奉献精神。”

在《中华牛文化》一书出版过程中，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宗兴、中国畜牧业协会会长张宝文为本书题词，中国奶业协会名誉会长刘成果先生、人民日报海外版总编辑张德修先生为本书作序，著名作家贾平凹先生为本书题写了书名，在此一并感谢。

最后，愿以“秦川牛精神”与业界同仁共勉，让我们携起手来，为弘扬牛文化、创新牛科技、发展牛产业。振兴牛经济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012年6月

目 录



题词一	陈宗兴
题词二	张宝文
序一	刘成果
序二	张德修
前言	咎林森

第一章 历史文化中的牛 1

一、牛驯化	1
二、历代牛的饲养措施	13
三、相牛法	16

第二章 政治文化中的牛 21

一、原始社会组织与牛	21
二、原始祭祀文化与牛	22
三、古代农耕文化与牛	26
四、古代国家政治文化与牛	28

第三章 农耕文化中的牛 34

一、牛耕起源	35
二、牛耕方式	38